

研究論文

跨國資訊政治： 當地方性抗爭遭遇國際媒體

黃廣生

摘要

在全球化語境下，國際媒體與威權國家草根式地方性社會抗爭之間的互動形塑了顯著的「跨國資訊政治」。本文從資源動員論的視角出發，將國際媒體視為一種抗爭資源，通過威權國家兩個相異個案的對比研究，從資源的有用性(resource usefulness)和資源的局限性(resource constraint)兩個維度解釋國際媒體和草根式地方性抗爭的互動邏輯；並揭示國際媒體作為一種具有語境依賴性(context-dependent)的抗爭資源，其有用性和局限性如何依據動態政治情境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在本研究看來，這是跨國資訊政治能否形成的關鍵。

關鍵詞：全球化、社會抗爭、跨國資訊政治、國際媒體、資源動員

黃廣生，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研究興趣：社會運動、政治傳播。電郵：hguangsh@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3年10月9日。論文接受日期：2014年2月28日。

Research Article

Trans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tic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Contentions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Vincent Guangsheng HUANG

Abstract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grassroots protests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has given rise to the “trans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tics”. Having exerted great pressure on domestic political control, trans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tics has posted challenge to the authoritarian rule in many countries. Previous research tends to treat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as scarce resources that local grassroots activists desperately need. However, it seems that in some cases the grassroots activists tend to refuse to speak out their voi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space. Why are some activists eager to get acc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some are not?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 mobilization, this research describes and then examines this interaction processes by comparing two protest cases from China. By contextualizing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media in different protest cases, the author proposes theoretical advances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s of “dynamic political context”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 role international media

Vincent Guangsheng HUANG (PhD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lay in local grassroots protest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s important protest resources, the usefulness and constraints of international media varied with the dynamic political contex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dynamic political context ultimately shapes the ways in which local grassroots activists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interact, and determines the degree to which local grassroots activism can evolve into trans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tics.

Keywords: globalization,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trans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media, resources mobilizat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uang, V. G. (2014). Trans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tic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contentions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0, 157–190.

鳴謝

感謝曾繁旭教授對本研究的啟發和指導。感謝張潔瑤同學為本研究烏坎議題的深度訪談提供幫助，感謝各位受訪者。感謝李立峯教授和諸位匿名評審為本文理論框架的調整和修改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一、引言

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國際社會與地方性抗爭 (local contention) 的互動關係成為抗爭政治研究的重要命題 (Tilly, 2004)。我們時常看到世界社會 (world society) 與民族國家內部的社會抗爭形成呼應，影響具體的政治過程。無論是呼籲環境保護的生活政治，還是關涉人權、民主的解放政治，很多地方性社會抗爭的治理越出了民族國家的界限，被放置在全球公民社會 (Thörn, 2007) / 跨國的公共 (transnational publics) (Olesen, 2005) 之中加以審視，全球治理 (global governance) 的效應日益顯現 (Finkelstein, 1995)。

在全球化的語境下，較為顯著的一種現象是民族國家內部的一些社會抗爭議題被捲入到「跨國資訊政治 (trans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tics)」之中 (凱克、辛金克, 2005; Ron, Ramos, & Rodgers, 2005)。本文所謂「跨國資訊政治」，指的是民族國家內部的社會抗爭通過與國際媒體互動，宣導國際規範 (international norm)，重新架構抗爭議題，並與威權國家形成框架爭奪，博取國際輿論支持，從而開啟跨國的「話語機會 (discursive opportunity)」，影響民族國家對國內社會抗爭的回應方式。

這種「跨國資訊政治」現象在威權國家草根式社會抗爭中尤為顯著。所謂「草根式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社會抗爭」指的「是底層民眾中對某些問題高度投入的積極分子自發地把周圍具有同樣利益、但卻不如他們投入的人動員起來，加入群體利益表達行動的過程」(應星, 2007; Norris & Cable, 1994)。在威權國家，草根式地方性社會抗爭時常呈現出基於具體利益的無組織或者弱組織自發動員狀態，資源十分匱乏。在這些草根式抗爭中，國際媒體通常能夠趕赴新聞現場，並迅速架構議題，促使草根式地方性抗爭議題獲得全球關注，提高其能見度，抬升政治鎮壓的成本。

然而，我們也觀察到，在威權國家，並非所有草根式地方性抗爭都採取「跨國資訊政治」策略。這就構成一個亟須理論解釋的問題。在威權國家的政治語境下，為甚麼部份草根式地方性抗爭積極與國際媒

體互動並形塑跨國資訊政治局面，而部份則不願意甚至拒絕與國際媒體互動呢？究竟哪些因素影響了抗爭者採取「跨國資訊政治」策略？這成為本研究探討的主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政體已經從集權政體過渡為威權政體 (Nathan, 2003)，但並未發生大的變化。在當下中國，抗爭政治個案的豐富性和複雜性為我們理解跨國資訊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本文將通過兩個相異中國個案的比較研究，從抗爭者的視角切入，考察跨國資訊政治的形成邏輯；並從資源動員論的視角出發，建構跨國資訊政治形成的解釋框架。具體而言，本研究將國際媒體視為一種抗爭資源，探討國際媒體作為民族國家內部社會抗爭資源的有用性 (resource usefulness) 和局限性 (resource constraint)，揭示國際媒體這一抗爭資源的有用性和局限性與威權國家「動態政治情境」的勾連。

本研究對資源動員理論、跨國資訊政治，以及國際媒體和社會抗爭互動關係等研究領域均有所推動。其實很多學者呼籲，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抗爭政治的研究必然要克服方法論民族主義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的局限，注重全球語境和國內抗爭的互動。不僅要考慮到國內政治過程對於地方性抗爭的影響，還要將全球結構 (global structure) 納入考量的範圍 (趙月枝, 2007; Jenkins & Schock, 1992)。本研究也響應了這一呼籲。

二、資源動員論視角下的跨國資訊政治

現有威權國家社會抗爭和國際媒體互動關係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路徑。一種路徑從跨國資訊政治的理論脈絡出發，探討作為跨國倡議網路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 核心的跨國 NGOs 如何塑造跨國資訊政治。現有研究者視 NGOs 為跨國倡議網路的核心，在案例選擇上也集中在資源比較豐富的抗爭形態——NGOs 主導的地方性抗爭 (Ron, Ramos, & Rodgers, 2005)；並未以草根式地方性抗爭和國際媒體的互動關係為核心考察對象，所以未能回應本研究關注的問題。

表一 兩種跨國資訊政治類型

兩種形態的跨國資訊政治	特點
國內NGOs——跨國NGOs	聚焦國內外NGOs組織的互動，由跨國NGOs來架構媒體，形塑資訊政治，媒體只是一個輔助的角色。
草根式的弱組織——國際媒體	沒有NGOs介入，直接由草根式的弱組織和國際媒體互動，形塑資訊政治。媒體扮演更為能動的角色。

另一種路徑則從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理論視角切入，關注地緣政治和一國媒體報導他國抗爭議題的框架選擇之間的關係。相關研究通常對靜態文本進行分析，揭示其中的報導偏向。但是這一取向更多只是將媒體報導偏向放在地緣政治的脈絡下來理解，揭示這種媒體報導偏向背後的國家利益和嵌入在新聞從業者認知圖式中的文化根源(張植榮、李昀，2006；郭永虎，2011；劉瑞生，2008；Fang, 1994；Lee & Yang, 1995；Li & St. Cyr, 1998；Stone & Xiao, 2007；Wang, 2008)。這類研究雖然有助於我們理解國際媒體報導其它國家社會抗爭背後的邏輯，但缺少國際媒體和地方性社會抗爭行動者之間互動的經驗資料，也就未能從抗爭者角度解釋跨國資訊政治。

以上兩種路徑均無法回應本研究的困惑。因此，本研究嘗試從資源動員論的視角出發，將國際媒體視為抗爭者的資源，從資源的有用性和局限性兩個維度解釋國際媒體和草根式地方性抗爭的互動邏輯，並揭示國際媒體作為一種具有語境依賴性(context-dependent)的抗爭資源，如何依據「動態政治情境」而在有用性和局限性之間轉化。「動態政治情境」和國際媒體有用性之間的關係成為本研究討論的重點，在本研究看來，這是跨國資訊政治能否形成的關鍵。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資源動員論批判傳統的社會心理學路徑(hearts and minds approach)，認為怨恨和相對剝奪感並不能解釋運動為何得以發起。因此，資源動員論者從結構條件解釋運動發起，強調抗爭組織和參與者所掌握資源是抗爭發起的關鍵(McCarthy & Zald, 1977)。在這一理論脈絡下，研究抗爭政治和媒體互動關係的學者傾向於將大眾傳媒以及日漸崛起的新媒體視為重要的抗爭資源(曾繁旭、黃

廣生，2013; Barker, 2008; Benford & Snow, 2000; Cammaerts, 2012; Gamson & Wolfsfeld, 1993; Garrett, 2006; Myers, 2000)。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國際媒體和地方性抗爭互動愈發頻密，國際媒體作為重要抗爭資源日漸受到關注 (Bob, 2005; Thörn, 2007; Castells, 2008)。

(一) 國際媒體作為抗爭資源

I. 威權語境下國際媒體的有用性：議題的全球化架構和輿論壓力塑造

隨着資訊全球化進程的推進，一個全球媒介空間日漸生成 (Castells, 2008; Olesen, 2005; Thörn, 2007)。透過這一空間，諸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抗爭議題曝露在全球觀眾 (global audiences) 面前，一種抗爭議題的全球化架構過程 (global framing) 成為可能 (Della Porta & Tarrow, 2007; Tarrow & McAdam, 2005)。國際媒體已經成為全球化語境下社會抗爭「多層次治理 (multi-level governance)」的重要一環 (Marks & McAdam, 1996)。國際媒體對議題的全球化架構使得抗爭者能夠與民族國家形成有效地框架爭奪，避免議題被民族國家單一架構，提升議題的全球可見度，從而使得民族國家內部的抗爭議題獲得全球性的關注。國際媒體因此成為威權國家地方性社會抗爭的重要資源，被視為規避威權政府鎮壓、獲得國際輿論關注的重要國際政治機會 (IPOS) (Bob, 2005)。

在社運學者 Gamson (2004) 看來，媒體的報導不僅能夠提升抗爭的能見度，還能夠給抗爭目標施壓。他認為，媒體成為政治利益的調解 (political interest mediation) 系統，成為抗爭者和權力之間博弈互動的平台。所以，國際媒體有用性還體現在透過塑造國際輿論施壓於抗爭目標國。當然，國際輿論施壓的效果與國際規範的力量 (norm strength) 和所在國家的國際接軌程度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息息相關。國際規範所擁有的力量越強，施壓目標國的國際接軌程度越高，壓力效果也就越明顯 (Cortell & Davis, 2000; Finnemore & Sikkink, 1998; Tsutsui & Shin, 2008)。

II. 威權語境下國際媒體的局限性：弱控制困境(weak control dilemma) 和政治風險

社會抗爭與國際媒體互動關係的研究多發現，國際媒體在日常新聞生產中遵循自己的邏輯。抗爭者必須通過策略地近用國際媒體，才能嘗試架構抗爭議題(曾繁旭，2006；Thörn, 2007; Waisbord, 2009)。這類研究指出，抗爭者必須「以時生動的方式對資訊進行包裝」(凱克、辛金克，2005：25)，以迎合國際媒體的新聞生產邏輯。媒體機構並非是中立的呈現者，往往抱持一定的偏向，而這很難被抗爭者所控制。學者Gamson(2004)則將這種情形稱之為「弱控制困境」。

威權國家抗爭者對國際媒體的弱控制，時常導致抗爭議題被國際媒體過分政治化。現有部分研究發現，國際媒體抱持西方中心主義的慣有認知框架，將威權國家建構成一個與自由民主之西方相對立的專制的「他者」，傾向於過分渲染威權國家的政治鎮壓和抗爭者對體制的挑戰(Fang, 1994; Lee & Yang, 1995; Li & St. Cyr, 1998; Stone & Xiao, 2007; Wang, 2008)。事實上，威權國家的草根式抗爭有很大一部份屬於社會抗議(social protest)而非造反(rebellion)，不具有實質意義的反體制傾向。¹因此，抗爭者都不同程度地重視政治合法性。國際媒體的這種報導邏輯無疑給抗爭帶來巨大的政治風險。對抗爭者而言，這成為國際媒體作為抗爭資源的一大局限。

必須指出，國際媒體過分政治化解讀所帶來的政治風險源於抗爭所在國的威權制度。威權語境自身就給國際媒體的過度政治化報導提供基礎。然而，威權國家習慣通過資訊控制壓制社會異議，忌憚國際媒體，常將國際媒體視為敵對勢力的輿論宣傳機器。所以在具體的社會抗爭中，國際媒體本身就被賦予一種負面的政治意涵。接觸國際媒體在某種程度上被解讀為通敵，容易招致清算。這成為抗爭者近用國際媒體時的主要擔憂。也因此，在具體的抗爭中，抗爭者時常進行自我審查和去政治化的努力(Ho, 2007)。

(二) 動態政治情境和國際媒體的有用性

在民主社會，很多國家逐步進入運動社會狀態，抗爭資源豐富(Meyer & Tarrow, 1998)。而相較而言，在政治控制嚴格的威權社會，

中層組織薄弱，缺乏資源成為眾多抗爭行動的共性（趙鼎新，2005）。因此，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很多文獻時常假定國際媒體是威權國家社會抗爭有用的資源（Bob, 2005）。很多討論抗爭資源的文獻也時常忽視抗爭資源是否「有用」，僅限於討論抗爭資源是否「可獲得」（resource availability）（Edwards & McCarthy, 2004）。不過，從抗爭者的視角出發，可獲得，未必意味着必然有用。基於這種考慮，筆者認為，有必要從抗爭者的視角反思國際媒體作為一種資源對於地方性抗爭的有用性問題。

其實對威權國家的社會抗爭加以分類，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國際媒體的有用性。對於造反一類的抗爭，國際媒體是非常有用的。因為他們尋求推翻體制，完全不畏懼合法化的問題。但是對於抗議，由於這類抗爭忌憚合法性，國際媒體是否有用就非常複雜，與動態政治情境息息相關。

本研究從兩個抗議個案中抽象出來的解釋框架也嘗試厘清，國際媒體作為抗爭資源的有用性和局限性如何依據動態政治情境而變化，並影響跨國資訊政治的形成。本研究中「動態政治情境」指的是社會抗爭過程中國家與抗爭者的互動關係情勢。其實，動態政治情境是威權體制在具體抗爭過程中的動態呈現。換言之，威權體制之下的國家和抗爭者在具體的抗爭中的有具體的、不盡相同的表現，故而呈現不同的互動狀態。現有研究傾向於將「威權體制」刻板化（趙月枝，2007）。其實，威權體制之下國家和抗爭者的互動關係並非必然是激烈對抗，威權體制應對抗爭也並非僅有鎮壓一種手法，而是存在複雜性（張永宏、李靜君，2012）。所以，在本文中，筆者嘗試以動態政治情境來概括這種威權體制下國家和抗爭者在具體抗爭中的具體表現。具體而言，這種動態政治情境涉及國家對抗爭的反應和抗爭者的抗爭姿態兩個維度。

所謂國家反應，在本研究中指的是國家對抗爭採取的態度和措施，包括剛性鎮壓和彈性瓦解兩種。值得指出，為了表述方便，這裏援用國家這個抽象概念。不過在具體的抗爭中，國家可以是抗爭所在地的基層政府，也可以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多層級政府策略互動的動態體系（張永宏、李靜君，2012；黃冬婭，2011）。剛性鎮壓指的是國家啟動暴力機器，強力閉合抗爭議題的傳播管道，從而將抗爭消滅於無

聲之中。而彈性瓦解則是國家未啟動暴力機器，也並未非常嚴格管控抗爭議題的傳播管道，而是以精緻靈活的統治策略瓦解抗爭。

所謂抗爭姿態，在本研究中指的是抗爭者在訴求表達(claims)和抗爭劇目(repertoires)中所蘊含的挑戰體制的意味。抗爭劇目即抗爭相關的行動方式和策略戰術(Tilly, 1995)。具體而言，訴求表達上的抗爭姿態，指的是抗爭訴求與既有政治權力架構安排之間的理念衝突程度，比如強調反對獨裁等具有刺激和挑戰現政權意味的訴求。而抗爭劇目上的抗爭姿態，指的是抗爭劇目與政治暴力機器之間的對抗程度。本文將抗爭姿態區分為高抗爭姿態(high-profile)和低抗爭姿態(low-profile)。

由於國家反應和抗爭姿態的差異，國家與抗爭者的互動關係具體主要有兩種：零和博弈與良性互動。值得指出，在具體抗爭中，政治情境是動態的，所以國家與抗爭者並非僅有一種互動關係，往往是因時期而變，在兩種互動關係之間轉化。當國家與抗爭者之間處於零和博弈狀態時：國家剛性鎮壓，啟動暴力機器並閉合抗爭議題的傳播機會，而抗爭者則採取高抗爭姿態與國家對抗。這時，抗爭者雖然有政治合法性顧慮，但他們的國內傳媒近用機會遭遇國家強力閉合，為了提升抗爭的社會能見度，避免被鎮壓，抗爭者傾向於尋求國際媒體的支援。因為一旦國內傳媒近用機會閉合，意味着抗爭者被集體「消聲」。而「消聲」不僅意味着沒法吸引公共輿論的關注，失去與政府談判的可能；更意味着可能面臨悄然鎮壓的風險。可以說，在制度性利益表達管道缺失的情況下，國內傳媒成為社會衝突性議題的重要傳播機會(夏倩芳、袁光鋒、陳科，2012；曾繁旭、黃廣生，2013)。而國內傳媒近用機會的獲得，往往受制於傳媒環境、抗爭者的傳媒近用能力等等因素(黃煜、曾繁旭，2011)。其中，最為要緊的是，在當下之中國，市場化啟動以來的傳媒體制並無大的改變，制度性力量對於傳媒的干預和支配力並無明顯減弱。於此背景之下，依賴於傳媒爭取抗爭傳播機會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夏倩芳、袁光鋒、陳科，2012)。所以，當國內傳播機會閉合的時候，國際媒體成為一個重要的替代性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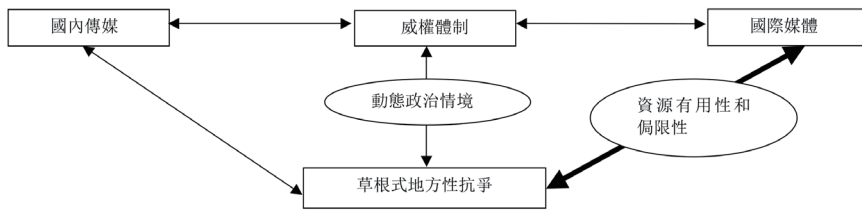
而當國家與抗爭者之間處於良性互動狀態時，國家未啟動暴力機器，也並未非常嚴格管控抗爭議題的傳播管道；抗爭者則採用較低抗

爭姿態，官民雙方形成良性互動局面。這種時候，國內傳播機會為抗爭者提供了重要的表達管道。一方面，這些近用機會的獲得有助於抗爭者爭取到社會輿論的支持，從而促使體制迫於輿論壓力展現某種開放的姿態，響應抗爭訴求。因為政府始終將為人民服務作為一種政治合法性 (political legitimacy) 的宣稱，所以當突如其來的民怨 (suddenly imposed grievance) (Walsh, 1981) 透過傳媒呈現出來的時候，為了彰顯合法性，政府就必須加以響應。另一方面，借助傳媒曝光還成為抗爭者自我保護的重要策略，不僅能夠提高社會能見度，而且還能抵擋政府鎮壓。也由於國內傳媒近用機會的存在，抗爭者傾向於拒絕國際媒體的採訪，國際媒體反而成為一種抗爭合法性的威脅。

下文，筆者將通過兩個來自中國的相異案例的具體對比，展現國際媒體的有用性和局限性如何依據動態政治情境轉化，並影響抗爭者和國際媒體的互動，從而影響跨國資訊政治的形成。具體的解釋框架如圖一所示：

圖一 解釋框架

草根動員地方性抗爭的跨國資訊政治



三、案例和方法

為了回應以上研究問題，本研究選擇兩個相異個案進行比較研究。第一個個案是2009年底發生在廣州番禺區的環境維權抗爭；第二個個案則是2011年底發生在廣東汕尾市烏坎村的土地維權抗爭。

2009年9月份，廣州市政府在未經民意聽證和環保評估的情況

下，擬在廣州番禺區建設垃圾焚燒爐。這一罔顧民意的舉動，受到當地民眾的激烈反對。他們組織了一系列的維權抗爭行動。在2009年的11月23日，千餘名番禺業主集體到廣州市城管委上訪，並「散步」到市政府廣場。這一維權抗爭最終以「暫停建設」獲得階段性勝利。而後，番禺抗爭者更是積極進行垃圾分類政策的宣導，目前獲得政府和民意合力推動「垃圾分類」政策的局面。

而2011年底，由於不滿村幹部把持村務四十餘年，且在任職期間變賣集體土地並從中漁利，廣東汕尾烏坎村的村民集體多次到汕尾、陸豐兩級政府上訪。他們提出了三大訴求：一則解決土地問題；二則舉行民主選舉；三則公開村政財務。期間，曾多次與警方發生衝突。整個抗爭事件持續了接近3個月的時間。直到12月20日，由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帶隊的工作組進駐烏坎，事件才得以基本平息。烏坎村重新舉行基層選舉，並在新村委的帶領下開始處理土地問題。

選擇這兩個個案，主要基於以下幾點考慮。其一，兩個抗爭案例均是抗爭者因不滿相關政府部門的具體決策而引發。這兩個個案均為草根動員形成的地方性社會抗爭，都是基於具體利益，比如土地或者生活環境品質等進行自發動員，符合本研究的需要。其二，在本研究看來，無論是番禺議題還是烏坎議題，均屬於社會抗議，都無意於挑戰現有體制。因此，烏坎和番禺議題的抗爭者都有政治合法性的擔憂，只是程度存在差異；這往往影響抗爭者與國際媒體的互動。本文要考察的正是抗爭者的政治合法性顧慮如何影響了其與國際媒體的互動。其三，這兩個個案的「動態政治情境」以及在「跨國資訊政治」策略的選擇上均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差異為我們理解地方性抗爭和國際媒體的互動邏輯提供了可能。

為了獲取上述兩個案例的資料，本研究主要採取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的方法。番禺垃圾焚燒爐議題，筆者從2009年的夏天就已經展開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烏坎議題，受物理距離的制約，筆者對抗爭領袖、抗爭者和報導議題的記者進行深度採訪。對抗爭者的訪談，旨在還原抗爭過程中抗爭者的真實心態、對國際媒體的態度和顧慮。與此同時，了解議題背後政府的管制，以及記者的新聞生產

邏輯。深度訪談對象共23位，絕大部分採用面對面的半結構化訪談方式。²

另外，本研究還輔以內容分析的方法。筆者收集了兩個議題國內外的相關報導文本，並編制了編碼表，對抗爭高潮階段報導進行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本研究的分析類目包括：報導的頻次、訊息源特徵、報導主題、關聯主題等。由於一篇報導往往包含了多個訊息源，甚至多個報導主題，因此本研究採用了重複統計的方式。筆者還對部分報導進行話語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以揭示語言符號背後深層次的意義結構。

在這兩個議題中，本文所指的國際媒體包括國際英文媒體和國際華文媒體兩個部分。國際英文媒體的選擇主要考慮其在整個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而國際華文媒體則包括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溫哥華等地區的華文報紙。主要基於以下幾點考慮：其一，由於語言的便利，這些華文報導對於抗爭者的影響比較顯著。其二，將港澳台的華文報紙列入其中，主要原因在於，港澳台等地的華文媒體也介入到這兩個議題之中。由於三地與內地的政治體制和新聞體制存在較大差異，且三地媒體的報導容易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存在與國際輿論場的聯動效應 (受訪者W, 2013)。出於以上考慮，本文將港澳台媒體也列入國際華文媒體的行列，進行檢閱，以確保本研究的分析能夠較為真實地反映報導的全貌。關於報導文本的收集方法，國內媒體報導和國際華文媒體報導部分，本研究主要通過慧科資料庫進行檢索。時段選擇上，本研究選取了抗爭發生的高潮階段。具體而言，番禺議題我們選擇了2009年9月23日到2009年12月23日這個時間段，從相關報導開始在媒體上出現到抗爭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時間節點。烏坎議題，出於同樣考慮，本研究則選擇了2011年9月21日至2011年12月21日這個時間段。

國際英文媒體部分，筆者則採用另外的抽樣規則，主要是由於國際媒體數量眾多。考慮到研究的便利性 (因為部分外國媒體的網站被中國政府屏蔽)，本研究抽取了6家英美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國際媒體，涵蓋報紙、雜誌和廣播，分別為美國的《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時代週刊》，英國的《衛報》、《每日電訊報》和英國廣播公司BBC；而

且還有兩家國際通訊社，分別為路透社和合眾國際社，以確保這種抽樣能夠較好代表外國媒體整體的報導情況。筆者採用全樣本收集，收集時間為2013年3月1日。所以報導只收集到這個日期，此後的相關報導不列入檢閱範圍。也即報導文本跨越的時段分別為：番禺議題，2009年9月23日到2013年3月1日；烏坎議題，2011年9月21日到2013年3月1日。

四、烏坎議題：國際媒體作為一種抗爭資源

(一) 國家與抗爭者的零和博弈

烏坎議題屬於草根式抗議，與造反不同。在議題早期，國家與抗爭者之間關係雖然緊張，但不至於進入零和博弈狀態。根據筆者對事件過程的梳理，在該議題中，國家和抗爭者之間的對抗關係，呈現一個逐步加劇並最終發展為零和博弈狀態的過程。

在抗爭初期，雖有對抗，但不至於進入零和狀態。此一階段政府採取彈性瓦解的方式，順利壓住了抗爭。在2011年9月21日和2011年9月22日，抗爭者採取集體上訪、圍攻派出所與市政府、推翻警車等抗爭劇目，與武警發生正面衝突，並傳出警方打死小孩的謠言。不過，政府成功地策略性應對：一方面順利控制大眾傳媒，一方面與抗爭者展開理性談判。在2011年9月24日，烏坎村民委派13位村民代表到陸豐市政府談判，政府承諾成立三個專項小組入村開展調查。根據訪談，早期政府也承認臨時維權理事會的合法地位，以便協助解決問題(受訪者G, 2013)。應該說，早期雙方關係雖然緊張、雖有對抗，但未到極端。

不過，在2011年的11月底，雙方關係開始惡化。一方面地方政府調查進度緩慢，一方面國內媒體集體噤聲，抗爭者沒有替代性表達管道。2011年11月21日，烏坎村4,000村民簽名聚集，再次列隊集體遊行至市政府上訪。這次，為了爭取國際媒體的關注，在抗爭訴求和劇目上採取更高姿態。比如，特意組織抗爭表演，並特意打出了「還我人權」、「反對獨裁」的敏感口號(受訪者G、W、J, 2013)。而這被地方

政府指控為「勾結境外敵對勢力」，地方政府採取了剛性鎮壓的手段，將烏坎抗爭者的上訪行動定性為「非法暴力群體事件」，連夜入村刑拘了若干抗爭領袖，甚至還動用國家暴力機器封鎖烏坎村。2011年12月9日之後村民則用大樹、釘板等作為路障，阻止警車入村。官民雙方上演一場對峙戰役。

由此可見，這種零和對抗關係的形成是一個逐步升級的過程，既與地方政治文化相關，又與抗爭者的抗爭姿態和媒體資源狀況相關。一方面，烏坎地處地級市，公民社會很不發達。且抗爭牽涉土地問題，資本和權力存在利益聯合，與此同時，地方政府也有着巨大的維穩壓力，高度利益捲入使得地方政府傾向於壓制抗爭。而烏坎抗爭者媒體資源有限，且遠離「媒體市民社會」（黃煜、曾繁旭，2011），所以未能獲得國內傳媒關注，議題無法公共化。於是，為了從國際媒體那裏獲得替代性支援，抗爭者採取了激進的對抗性策略（confrontational strategies）（Kitschelt, 1986），試圖製造媒體事件，迎合國際媒體的期待。而這又抬升了抗爭姿態，也招致地方政府的剛性鎮壓，形成零和博弈局面。

（二）國內傳媒近用機會的閉合

在烏坎議題中，由於國家與抗爭者處於較為緊張的對抗甚至零和博弈狀態，抗爭者雖然非常積極聯繫傳統媒體，但由於政府宣傳部門極為嚴格的媒體管制，始終難以獲得傳媒近用機會。在宣傳部門的干預之下，國內媒體完全成為了政府的喉舌，並未表現出採訪的意願（受訪者T、V，2013）。而前來採訪的國內媒體，則一律刊發政府的通稿。部分媒體雖然一早介入，卻只能寫內參而不能發稿件。

在採訪中，記者們告訴筆者，在這種極為敏感的議題中，禁令非常嚴格。且「沖禁令」，容易招致宣傳部門「秋後算帳」。因此，媒體人不敢「沖禁令」，媒體只呈現政府一方的聲音。抗爭者抱怨，「國內（媒體）不是跟政府約好的，都進不來。來的都是發政府給的通稿。南方網發的通稿就把我們害慘了，就被定義成『暴民』、『打砸事件』、『群體事件』」（受訪者G，2013）。

本研究對收集到的國內54家媒體的111篇報導進行內容分析，發現這些報導全部都是站在官方的立場上，通報情況。其訊息源基本上是政府宣傳部門。南方日報、中國新聞社、新華社等幾家媒體雖然也自行採寫，但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場上，且被國內的其他媒體引用。這些新聞非常類似，基本都是脫胎自若干通稿。

表二 烏坎議題國內媒體稿件來源統計

稿件來源	所佔百分比 (n=111)
南方網訊	0.9%*
羊城晚報訊	1.8%
大洋網訊	1.8%
汕尾宣	9.9%
南方日報訊	11.7%
汕尾黨政資訊網	6.3%
中新社	5.4%
廣州日報訊	6.3%
自行採寫	7.2%
陸通	6.3%
陸新發	9%
汕尾陸豐市委宣傳部	9.9%
新華社	23.4%

*這意味着國內媒體該議題的報導中南方網作為稿件來源的稿件佔總數的0.9% (n=1)。

表三 烏坎議題國內媒體報導主題

報導主題	所佔百分比 (n=111)
村民打砸 政府積極處置	12.6%*
官方闢謠：警方打死小孩	1.8%
事件平息 村民獲滿意答覆	3.6%
村民再度上訪 政府積極處置	4.5%
官方通報：村民訴求基本解決	11.7%
境外勢力煽動	3.6%

報導主題	所佔百分比 (n=111)
五村民被刑拘	12.6%
薛錦波之死 未發現外力致死	28.8%
疑犯狀況很好 家屬探監	0.9%
汕尾烏坎事件兩村官被雙規 政府收回土地	6.3%
省工作組進駐陸豐解決烏坎事件	11.7%
烏坎事件挑頭者如繼續對抗必當追究	1.8%

*這意味着烏坎議題國內媒體中有 12.6% (n=14) 的報導的主題為「村民打砸 政府積極處置」。

(三) 國際媒體作為抗爭資源的有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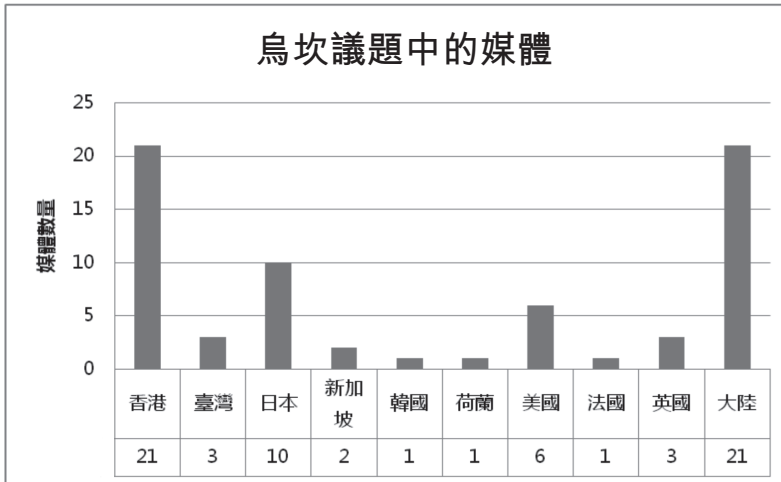
由於國內傳媒都站在政府的立場上，烏坎抗爭者因此有了一種被「屠村」、「滅村」(受訪者O, 2013)之類的絕望感，覺得非常「孤立無援」(受訪者M, 2013)。他們在村裏拉起橫幅「南方網是媒體行業的頂級敗類，報導不客觀」，抗議國內傳媒的不實報導。

抗爭者告訴筆者：「那個時候封村，封村的時候記者已經來了很多了。那個時候要不是香港和國外媒體曝光出去，整個村子就完了。那個時候你看，海上也封了，全部都封鎖了。感覺都好像等着讓人殺了。就像豬圈裏的豬一樣。」(受訪者L, 2013)

在烏坎抗爭者看來，尋求國際媒體的支援，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迫於無奈的政治突圍。因為國內傳媒近用機會的閉合，意味着沒有機會獲得社會的關注，可能被威權政府鎮壓。也正因此，他們嘗試尋求國際媒體的幫助，獲得國際關注。在這樣的政治語境下，國際媒體作為抗爭資源的有用性開始凸顯。

抗爭者們主動聯繫境外媒體，積極為他們提供素材；並且為境外記者作採訪的嚮導，協助境外媒體記者突破政府宣傳部門的封鎖，進入烏坎採訪。他們還成立了「新聞中心」，為外國記者提供食宿；甚至為了吸引境外媒體的關注刻意製造媒介事件，集會示威。他們積極和國外媒體記者交換名片，並保持聯繫。筆者統計了抗爭者G提供的部分媒體記者的名片，總共有69家，分別來自香港、台灣、日本、新加坡、韓國、荷蘭、美國、法國、英國等國家和地區。

圖二 烏坎議題中的媒體統計



I. 抗爭議題的全球化架構

在烏坎議題中，國際媒體的介入，導致抗爭議題得以獲得全球化架構。由於官民對抗步步升級，國際媒體在2011年12月10日之後進入報導的高峰期。大量媒體記者進入烏坎採訪。據維權精英G回憶，「12月11至20號進來了20多家媒體。」這種頻密互動的結果，就是國際媒體的報導篇數隨着抗爭過程的進展不斷的攀升。在2011年9月22日第一次集體上訪之後，國際媒體報導數量呈上升趨勢。本文所統計的8家國際英文媒體的報導總數為108篇，其中抗爭高潮階段共有46篇。國際華文媒體方面，烏坎議題則受到27家國際華文媒體關注，報導數量為279篇。

國際媒體的報導提供了更為多元的消息來源，使得資訊真實性的損耗降低。根據本研究的統計，無論是國際華文媒體還是國際英文媒體，抗爭者成為比例最高的訊息源，分別為51.8%和55%，是官方訊息源的兩倍多。這意味着抗爭者獲得更多的表達空間。

表四 烏坎議題國際媒體訊息源統計

訊息源	國際華文媒體 (n=637)	國際英文媒體 (n=249)
官方	22.1%*	16.1%
抗爭者	51.8%	55%
傳統媒體	17%	18.1%
互聯網	1.9%	2.8%
其他	7.2%	8%

*這意味着國際華文媒體該議題的報導中官方訊息源佔總訊息源的22.1% (n=141)。

而且，他們也提供了對議題多角度的報導，使得議題被更全面地呈現。根據統計，「政府鎮壓抗爭」、「抗爭訴求」和「薛錦波死亡真相」成為國際華文和國際英文媒體報導的重點，數量佔所有報導的前三位。

表五 烏坎議題國際媒體報導主題統計

報導主題	國際華文媒體 (n=447)	國際英文媒體 (n=96)
各地聲援抗爭	4.3%*	2.1%
烏坎抗爭影響汪洋仕途	3.1%	5.2%
中國政府控制衝突資訊傳播	3.1%	11.5%
臨時維權理事會民主選舉	1.8%	0
外國記者採訪紀事	2.9%	1%
政府鎮壓抗爭	30%	29.2%
政府回應抗爭訴求	9.6%	6.3%
抗爭訴求	18.8%	16.7%
政府稱有境外敵對勢力介入	5.4%	2.1%
廣東放鬆遊行管制	0.9%	0
薛錦波死亡真相	14.8%	20.8%
抗爭向周邊地區擴散	5.4%	5.2%

*這意味着國際華文媒體該議題的報導中「各地聲援抗爭」這一主題出現次數佔所有主題出現次數的4.3% (n=19)。

II. 國際輿論壓力塑造

更為關鍵的是，國際媒體的在場，使得抗爭者和威權體制同時被曝露在全球觀眾圍觀的媒介空間裏，這對地方性社會抗爭治理構成直接的軟約束。隨着議題在國際社會關注度的提升，抗爭者避免了被黨國體制強硬鎮壓。

多家外國報紙都認為，國際媒體的重要作用在於築起一道人牆(human shield)，這道人牆的意義在於抵擋威權體制的武力鎮壓。2011年12月17日英國《每日電訊報》就在報導中稱：「媒體的存在築起一道人牆，在媒體聚光燈的照耀下，政府不敢派遣渾身武裝的准軍事力量。」³

抗爭者也感覺到國際媒體的施壓效果。「還是借助外國的多家媒體，對我們烏坎的關注，特別是在11月尾到12月初的時候，一天有五六家在我們這裏，哪裏的都有，對外報導我們的這個事情，給我們當地政府施加壓力。」(受訪者N，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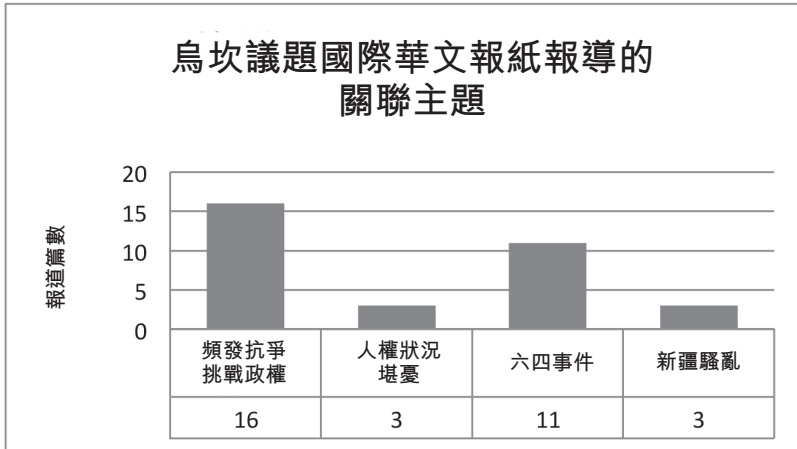
(四) 策略地規避國際媒體局限性

I. 國際媒體的弱控制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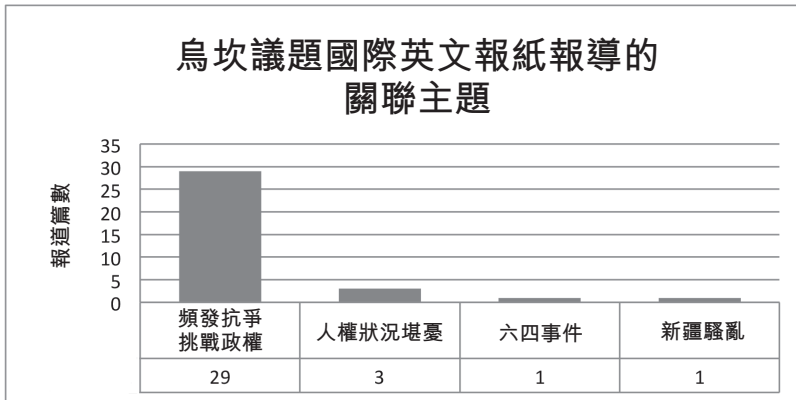
根據本研究的內容分析，對於烏坎議題的解讀，國際媒體大多將之放置在「中國社會抗爭頻發，挑戰政權」的潛在認知框架中。典型表述為：「儘管統治中國幾十年來，共產黨已經通過發展經濟來確保自身的權力不被挑戰，但是這個國家每年還是面臨成千上萬的小型抗議和騷亂，在底層瓦解黨的權威。」⁴

國際媒體還將烏坎議題和「人權」、「六四事件」甚至「新疆騷亂」等主題聯繫在一起。比如，用「心狠手辣的(heavy-handed)」、「軟硬兼施的(a carrot and stick approach)」這樣的詞彙來形容中國政府對待抗爭的手段，⁵並援引國際人權組織作為訊息源，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⁶根據本研究的統計，國際華文報紙的報導中，有11篇將烏坎議題和「六四事件」聯繫在一起；國際英文媒體則頻繁強調「頻發抗爭挑戰政權」(29篇)。

圖三 烏坎議題國際華文報紙報導的關聯主題



圖四 烏坎議題國際英文媒體報導的關聯主題



國際媒體強調抗爭者挑戰體制、脫離體制，⁷將抗爭描述為「起義」、「造反」，認為抗爭者「寫下中共建政以來，地方首度完全脫離中央掌控的紀錄」，將抗爭者的上訪行為描述為「六四後中國示威遊行之罕見」，⁸暗示現時烏坎村的狀況「與1989年『六四』鎮壓前的形勢很相似」。

國際媒體的這種報導框架招致了地方政府的強烈反應，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特別強調，有境外勢力對今次事件推波助瀾，致使本已平

息的事件又趨嚴重，改變了事件的性質。」⁹鄭痛批國際媒體，斥責抗爭者「像這樣負責任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國外幾個爛媒體、爛報紙、爛網站，好壞都顛倒了」。¹⁰

II. 抗爭者策略性規避國際媒體的局限性

顯然國際媒體的報導框架進一步抬升了烏坎抗爭者的政治風險。國際媒體傾向於忽視抗爭的土地利益訴求而強化政治意味，對他們的維權行動進行選擇性呈現。不過此時，官民衝突已經到達零和博弈狀態。雖然他們目標上只是為了解決土地利益問題，但行動上抗爭姿態極高。他們自己也清楚這一點。雖然在公開場合抗爭者不時強調烏坎的抗爭只是利益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但私底下，他們也認為自己的維權行動已經不可逆轉地和政府形成激烈對抗，和起義差不多，確實脫離了共產黨的領導，政治風險已經很高了(受訪者G、W、J，2013)。比如抗爭精英J在接受筆者的採訪時，將烏坎的抗爭視為一場農民運動，並將其與歷史上的農民運動並置。此時，國際媒體的這種局限性和被鎮壓的風險相比，不足為道。他們重視的是國際媒體將議題公共化的力量，近用國際媒體成為他們規避鎮壓的策略。

當然，他們也嘗試策略性規避國際媒體的這一資源局限性。他們姿態上反對國際媒體將抗爭定義為「起義/運動」，並強調對中央的支持。還特意用英文書寫聲明，貼在村口的告示欄裏。在聲明中，他們聲稱「我們擁護共產黨，我們愛國家」。他們還將這份聲明掛到網路上。在訪談中，抗爭者G告訴筆者，「當地政府就是拿這個給我們扣帽子，說我們勾結境外勢力，所以我們肯定不能讓他們這麼報導啦。要不然，官方就有理由和藉口鎮壓我們。私下裏可以這樣看，但是在媒體上不能出現這樣的報導」。

行筆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家與抗爭者處於零和博弈狀態時，國際媒體作為抗爭資源的有用性，以及抗爭者如何能動規避國際媒體局限性的動態過程。由於國家與抗爭者關係的高度緊張，國際媒體作為一種重要抗爭資源為抗爭者所積極援用。當然，由於國際媒體固有的認知框架和新聞生產邏輯，國際媒體的局限性也需要抗爭者策略地加以規避。在這個個案中，政治風險得以規避，一方面得益於抗爭者

的策略，一方面則得益於國際媒體的積極關注所形塑的巨大國際輿論壓力。更寬泛的結構性解讀，則可能與具體的政治機會息息相關。

下文，筆者將以番禺議題為例，展現國際媒體的有用性如何依據具體政治情境的變化而變化。

五、番禺議題：國際媒體被視為一種威脅

(一) 國家與抗爭者之間的良性互動

相較而言，番禺的抗爭者和國家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關係。廣州市地處廣東省會，公民社會和公民文化發達。而且，廣州本地媒體資源也非常豐富，有學者將其稱為「高度發達的媒體市民社會」(黃煜、曾繁旭，2011)。在這種政治氛圍中，抗爭者表達管道較多。且政府也開放各種管道，採取比較溫和的方式來對待抗爭者。比如舉辦各種類型的接訪、聽證會、環評、見面會等等。這些都有效地引導抗爭者採取融入性策略 (assimilative strategies) (Kitschelt, 1986)。

番禺的抗爭者也強調理性抗爭，抗爭姿態一直比較低。從抗爭訴求上看，他們並沒有如烏坎村民那麼具有挑戰意味的訴求，主要是要求政府傾聽民意，反對垃圾焚燒這一公共政策。就抗爭劇目而言，一開始，業主們通過虛擬社群論壇，號召大家採取行政訴訟的方式來表達訴求 (受訪者F, 2009)。行政訴訟未果，社區業主開始通過舉行各種具有中產趣味的集體行動表達訴求：比如單車遊、環保地鐵一日遊、車隊遊行、口罩行為藝術集體表演，等等。另外他們還通過集體寫郵件轟炸環保部門郵箱等新型的線上抗爭方式表達不滿。即使是在整個抗爭的最高潮，番禺的業主們齊聚廣州城管委和市政府門口，以遊行來表達訴求，也非常理性，並未與政府發生衝突。而集體「散步」之後，業主們還是強調理性抗爭。¹¹ 他們不僅給政府送錦旗表彰政府傾聽民意，也不斷在論壇上呼籲理性抗爭，希望業主們不要採取過激行為 (受訪者B, 2010)。雖然也有部份抗爭者被警方傳喚，但並無出現武力鎮壓等情形。整體上，雙方形成了較為良性的互動，使得抗爭過程沒有出現激烈的對抗局面。

(二) 國內傳媒近用機會並未閉合

在新聞記者和編輯看來，番禺議題政治風險較低，所以媒體敢於「沖禁令」(受訪者T、S、Q、V，2010；2013)。番禺議題中，宣傳部門在整個事件中發了三、四次禁令，但並不如烏坎議題嚴格。因此，在番禺議題中，抗爭者掌握了較為豐富的媒體資源，獲得了較為寬松的傳媒近用機會。這使得番禺議題快速上升為重要的公共議題，獲得社會輿論的關注。這些傳播機會的獲得，在一定程度上為抗爭者和政府的協商提供了平台和空間。

國內媒體、尤其是本地媒體對議題進行了大量的報導。在2009年的9月23日至12月23日這段時間，廣州本地11家報紙——《南方都市報》、《新快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南方日報》、《資訊時報》、《南方週末》、《南方農村報》、《羊城地鐵報》、《珠江商報》、《番禺日報》共採寫報導252篇。而根據訪談，各報都派出了一個記者團隊對該議題進行了報導。一開始，《新快報》主要有2名記者參與事件的報導，後來事態逐漸演變，增加到5名記者。而《南方都市報》則由12名記者構成事件的報導隊伍，聲勢浩大(曾繁旭、黃廣生，2013)。

表六 番禺議題廣州本地各媒體報導數量

報紙名稱	報導所佔百分比 (n=252)
南方都市報	34.9%*
新快報	22.6%
羊城晚報	15.1%
南方日報	9.5%
資訊時報	8.3%
廣州日報	5.2%
南方週末	1.6%
羊城地鐵報	1.2%
南方農村報	0.8%
珠江商報	0.4%
番禺日報	0.4%

*這意味着南方都市報該議題的報導量佔廣州本地媒體報導總量的34.9% (n=88)。

表七 番禺議題中南方都市報和新快報資訊源統計

訊息源大類	訊息源小類	南方都市報 (n=302)	新快報 (n=167)
支持焚燒類	政府官員	44%*	34.1%
	相關企業	6.3%	5.4%
	支持派專家	4.6%	3%
	合計	54.9%	42.5%
反對焚燒類	業主和村民	28.8%	40.1%
	一般民眾和網友	5.3%	7.2%
	(李坑)受害者	0.7%	1.8%
	反對派專家	6%	3%
	其他媒體	1.3%	0%
	民間團體	0.7%	4.2%
	環評機構	2.3%	1.2%
	合計	45.1%	57.5%

* 這意味着南方都市報該議題的報道中政府官員佔總訊息源的44% (n=133)。

更為重要的是，廣州本地各報傾向於表達抗爭者的聲音、強化抗爭者的政策訴求，並嘗試推動政府響應。各報在報導中，訊息源較為平衡。以《南方都市報》和《新快報》為例，《南方都市報》的訊息源中，支持焚燒類訊息源佔總數的54.9%，反對焚燒類訊息源則為45.1%；《新快報》支持焚燒類訊息源佔總數的42.5%，反對焚燒類訊息源則為57.5%。兩報的訊息源引用基本平衡。而且對議題持續跟進，對議題的各個側面進行較為全面的報導。另外，各報記者還通過私人的關係網絡，將議題帶入全國輿論場(曾繁旭、黃廣生，2013)。番禺議題，筆者總共收集到國內非廣州地區96家報紙共191篇報導。另外，中央電視台等中央級的電視媒體也及時跟進，形塑了巨大的輿論壓力。

(三) 令人擔憂的國際媒體局限性：政治風險

在抗爭者看來，國內傳統媒體能夠協助他們把聲音「放大」出來(受訪者B，2010)，成為自我保護、抵擋政府鎮壓的重要策略，有效規避

政治風險(受訪者C, 2009)。最為關鍵的是, 在番禺的抗爭者看來, 只要國內傳媒還能報導, 意味着政治空間仍有。特別是中央級媒體的介入, 給他們以最大的希望。因為在他們看來, 這是一種政治機會的「風向標」(受訪者B, 2010)。

因此, 國際媒體並沒有成為他們的選擇, 因為國際媒體的介入對於他們而言反而提升了抗爭的政治風險。所以, 抗爭者在抗爭過程中不主動聯繫國際媒體, 甚至拒絕國際媒體的採訪。番禺抗爭者B就說:「國外的呢, 我們都不太接受。那個時候有個德國的媒體說要採訪我, 但是我都不太接受。說實話, 我們這個是對事, 不太討論政體、不涉及政治。一涉及政治呢, 這個敏感程度太高了。」抗爭者F則說:「外媒的採訪, 我會儘量少接受, 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和國外和香港都不一樣。我們是不接受外媒的採訪, 北風他們是有背景, 但是我們是沒有背景的, 我們是一般的公民。」

因此, 抗爭者和國際媒體的互動並未能形成。番禺議題中出現的零星國際媒體報導, 其實是當時廣州媒體人北風透過推特(Twitter)與國際媒體聯繫的結果, 並非是番禺業主們主動聯繫採訪。根據筆者統計, 在番禺議題中, 本研究所統計的8家國際英文媒體的報導總共才有11篇。國際華文媒體方面, 番禺議題僅得到國際華文媒體共有11家報紙34篇報導。且國際媒體對此事的報導僅限於「集體散步」這一插曲。

六、結論和討論

至此, 本文以威權國家的兩個草根式地方性抗爭為個案, 從資源動員論的理論視角出發, 揭示了跨國資訊政治的形成邏輯。本研究發現, 國際媒體作為一種抗爭資源的有用性與具體的政治語境息息相關, 受具體抗爭過程中國家與抗爭者互動關係的影響。當國家與抗爭者關係高度緊張、處於零和博弈狀態時, 國際媒體的資源有用性被凸顯, 而資源局限性則被遷就, 抗爭者傾向於主動和國際媒體互動, 並將之視為一種規避鎮壓的政治突圍。而當國家和抗爭者處於良性互動

狀態時，國際媒體作為一種抗爭資源的局限性則首先被考慮，被抗爭者視為一種合法性威脅而非資源。所以，抗爭者傾向於拒絕國際媒體的採訪，跨國資訊政治局面難以形成。

概言之，本研究對於以下若干領域的研究將有所推進。其一，本研究並未採用地緣政治的研究路徑。在本研究看來，跨國資訊政治並非是一種簡單的報導文本上的呈現。基於這樣的看法，筆者對跨國資訊政治的研究力圖還原抗爭者、政府和國際媒體在抗爭議題發展過程中的動態互動和博弈。現有研究鮮有具體考察地方性抗爭與國際媒體之互動過程及其影響因素。故而本文算是一個初探性的研究。

其二，現有跨國資訊政治的研究偏向於考察NGOs作為跨國倡議網路之核心如何塑造跨國資訊政治，且以NGOs主導的地方性抗爭與國際社會的互動作為核心考察對象。在本研究看來，草根動員形成的地方性抗爭政治已經成為當下中國非常顯著的一種抗爭形態。這種抗爭形態由於組織資源的匱乏，與國際媒體的互動策略顯然與早前的研究有巨大的差異。而且在這種抗爭中，國際媒體的角色也更為複雜和多元。所以在本文看來，草根式的地方性抗爭和國際媒體的直接互動也應是一種非常顯著的跨國資訊政治類型。本研究因此也豐富了跨國資訊政治的類型。

其三，很多社會運動的研究文獻都傾向於認為，西方社會的資源必然是威權國家社會抗爭的解放性力量。認為源自西方國家的抗爭資源將為威權國家組織資源匱乏的地方性社會抗爭提供巨大幫助，成為落後的、威權的非西方國家社會抗爭的解放性力量(Chabot & Duyvendak, 2002; Liu, 2006; Matsuzawa, 2011)。因為這種潛在的假定，這類研究更關心的是「資源的可獲得性(resources availability)」和資源的分配(resources distribution) (Edwards & McCarthy, 2004)。當然，後續的研究逐漸有所反思，指出，以往的研究忽視了地方性社會抗爭主體的能動性，也忽視了具體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對社會抗爭主體靈活運用外來資源的動態過程(Liu, 2006)。這類研究從地方性社會抗爭主體出發，展示了抗爭主體依據動態政治情境運用外來抗爭資源的動態過程。一些學者聚焦於抗爭主體的能動性，探討不同國家政治社會背景的差異導致社會

抗爭主體對相同抗爭資源的不同態度，或者如何依據國情對外來資源進行改造和利用。筆者的研究基本延續了這樣的考察路徑。在筆者看來，任何抗爭資源都是具有有用性和局限性的，而資源是否可用往往與具體政治社會語境息息相關。所以筆者將焦點集中在怎樣的政治情境下抗爭資源「有用 (usefulness)」，而不僅僅是資源「可不可獲得 (availability)」。本研究也展現了國際媒體這一抗爭資源如何在具體的政治語境下在有用性和局限性之間發生轉化，展現了抗爭主體依據具體政治情境對國際媒體這一抗爭資源的能動運用。這對理解資源動員論視角下抗爭資源的有用性將有所推進。

本研究以兩個中國的抗爭議題為個案，所得研究結論對於理解中國社會抗爭與國際媒體的互動邏輯將有所啟發。而且，本文考察的這種草根式抗議是諸多威權國家的普遍現象。比如，近十年來，在埃及、約旦、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及海灣國家也頻繁爆發草根式抗爭，且大多數抗爭同樣只涉及社會經濟利益，而無法與政治訴求有效整合，停留在抗議層面，並未對威權或半威權 (semi-authoritarian) 體制構成威脅 (Ottaway & Hamzawy, 2011)。於此同時，政治體制也存在相似性。中國、阿拉伯地區的諸多國家同樣處於轉型期，其政治體制多是具有一定民主特徵的混合威權體制 (李意, 2012)。再有，各國同樣處於資訊全球化進程中。鑒於此，本文的研究結論也將增進對其他威權國家草根動員地方性抗爭和國際媒體互動關係的理解，對其他威權國家的相關研究具有借鑑意義。

當然，各個威權國家在具體抗爭中，動態政治情境還是存在具體差異，尤其是政府應對抗爭的能力存在不同。比如，中國政府學習能力強，其威權體制更具韌性 (Nathan, 2003)，政府吸納和瓦解抗爭的能力強 (張永宏、李靜君, 2012)。而阿拉伯地區很多國家都是單一領導人長期執政，掌控政局的能力不斷弱化 (李意, 2012)。這些動態政治情境差異的存在，也意味着其地方性抗爭和國際媒體的互動關係，與中國相比較肯定存在不同，這有待更多個案的細緻研究。

註釋

- 1 草根式地方性抗爭形態大致也可以歸結於國內政治衝突 (domestic political conflict) 的範疇。有學者 (Jenkins & Schock, 1992) 用國內政治衝突這一概念來概括非體制化 (noninstitutionalized) 的集體行動，並依據訴求目標將國內政治衝突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社會抗議 (social protest)，另一種則為造反 (rebellion)。前者針對具體的公共政策，後者則是針對體制。
- 2 本研究番禺議題的案例材料來源於筆者參與其中的、由曾繁旭教授主持的研究項目，感謝曾教授在筆者碩士研究生階段的悉心指導。
- 3 Simpson, P. (2011, December 17). China's rebel villagers in Wukan threaten to march on government offices. *The telegraph*.
- 4 Pomfret, J., & Buckley, C. (2011, December 12). Villager dies in custody as China cracks down on land protests. Reuters.
- 5 Pomfret, J. (2011, September 23). Hundreds protest in south China over land grab. Reuters.
- 6 Pomfret, J., & Buckley, C. (2011, December 12). Villager dies in custody as China cracks down on land protests. Reuters.
- 7 Pomfret, J. (2011, December 14). Tension simmers in blockaded China village after land protest. Reuters; Buckley, C. (2011, December 15). China villagers defy government in standoff over death. Reuters. ; Simpson, P. (2011, December 17). China's rebel villagers in Wukan threaten to march on government offices. *The telegraph*.
- 8 陳成良 (2011年12月15日)。〈抗議貪官賣地 廣東烏坎村遭封鎖〉，《自由時報》。
- 9 《南洋商報》(2011年11月23日)。〈汕尾6千人反獨裁捍衛土地 傳廣東書記默許示威〉。
- 9 大洋網 (2011年12月9日)。〈烏坎村921事件處置情況通報 打砸為首分子被拘〉。2013年3月取自：http://news.dayoo.com/news/201112/09/85080_20884797.htm
- 10 《太陽報》(2011年12月21日)。〈汕尾書記發爛渣：境外傳媒靠得住 豬乸會上樹〉。
- 11 在江外江論壇上可以看到大量這種類型的帖子。比如2009年11月24日集體「散步」之後 sting 在論壇上發帖〈【余，含淚懇求】我們一定要注意抗爭方式〉；fofun 同日發帖〈呼籲：別將民生問題政治化〉；等等。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Chinese Section)

- 李意 (2012)。〈阿拉伯国家的抗争政治：动因及结果〉。《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第29期，頁144-156。
- Li Yi (2012). Aalabo guojia de kangzheng zhengzhi: Dongyin ji jieguo. *Waijiao pinglun*, 29, 144-156.
- 夏倩芳、袁光鋒、陳科 (2012)。〈制度性資本，非制度性資本與社會衝突性議題的傳播——以國內四起環境維權事件為案例〉。《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2期，頁21-66。
- Xia Qianfang, Yuan Guangfeng, & Chen Ke (2012). Zhiduxing ziben, fei zhiduxing ziben yu shehui chongtuxing yiti de chuango—yi guonei siqi huanjing weiqian shijian wei anli. *Chuangbo yu shehui xuekan*, 22, 21-66.
- 張永宏、李靜君 (2012)。〈制造同意：基層政府怎樣吸納民眾的抗爭〉。《開放時代》，第7期，頁5-25。
- Zhang Yonghong, & Li Jingjun (2012). Zhizao tongyi: Jiceng zhengfu zenyang xina minzhong de kangzheng. *Kaifang shidai*, 7, 5-25.
- 張植榮、李昀 (2006)。〈美國主流媒體《紐約時報》涉藏報導分析〉。《對外大傳播》，第12期，頁43-45。
- Zhang Zhirong, & Li Yun (2006). Meiguo zhuliu meiti Niuyueshibao shezang baodao fenxi. *Duiwai dachuanbo*, 12, 43-45.
- 郭永虎 (2011)。〈1949-1959年美國《紐約時報》涉藏報導初探〉。《當代中國史研究》，第18期，頁113-118。
- Guo Yonghu (2011). 1949-1959 nian meiguo niuyueshibao shezang baodao chutan. *Dangdai zhongguoshi yanjiu*, 18, 113-118.
- 曾繁旭 (2006)。〈NGO 媒體策略與空間拓展——以綠色和平建構「金光集團雲南毀林」議題為個案〉。《開放時代》，第6期，頁22-42。
- Zeng Fanxu (2006). NGO meiti celve yu kongjian tuozhan—yi lvse heping jian'gou "jinguang jituan Yunnan huilin" yiti wei ge'an. *Kaifang shidai*, 6, 22-42.
- 曾繁旭、黃廣生 (2013)。〈地方媒介體系：一種都市抗爭的政治資源〉。《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4期，頁103-138。
- Zeng Fanxu, & Huang Guangsheng (2013). Difang meijie tixi: Yizhong dushi kangzheng de zhengzhi ziyuan. *Chuangbo yu shehui xuekan*, 24, 103-138.
- 黃冬婭 (2011)。〈國家如何塑造抗爭政治：關於社會抗爭中國家角色的研究評述〉。《社會學研究》，第2期，頁217-242。

- Huang Dongya (2011). Guojia ruhe suzao kangzheng: Guanyu shehui kangzheng zhong guojia juece de yanjiu shuping. *Shehuixue yanjiu*, 2, 217–242.
- 黃煜、曾繁旭 (2011)。〈從以鄰為壑到政策倡導：中國媒體與社會抗爭的互激模式〉。《新聞學研究》，第109期，頁167–200。
- Huang Yu, & Zeng Fanxu (2011). Cong yilinweihe dao zhengcechangdao: Zhongguo meiti yu shehui kangzheng de huji moshi. *Xinwenxue yanjiu*, 109, 167–200.
- 瑪格麗特·E·凱克、凱薩琳·辛金克 (2005)。《超越國界的活動家——國際政治中的倡議網路》(韓召穎、孫瑩麗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Keck, M. E., & Sikkink, 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gelite E Kaike, Kaisalin Xinjinke (2005). *Chaoyue guojie de huodongjia: Guoji zhengzhi zhong de changyi wangluo* (Han Zhaoying, Sun Yingli,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Keck, M. E., & Sikkink, 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趙鼎新 (2005)。〈西方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發展之述評〉。《社會學研究》，第1期，頁168–209。
- Zhao Dingxin (2005). Xifang shehui yundong yu geming lilun fazhan zhi shuping. *Shehuixue yanjiu*, 1, 168–209.
- 劉瑞生 (2008)。〈涉藏報導與美國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性〉。《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5期，頁17–22。
- Liu Ruisheng (2008). Shezang baodao yu meiguo zhuliu meiti de yishixingtai xing.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15, 17–22.
- 應星 (2007)。〈草根動員與農民群體利益的表達機制——四個個案的比較研究〉。《社會學研究》，第22期，頁1–24。
- Ying Xing (2007). Caogen dongyuan yu nongmin qunti liyi de biaoda jizhi—sige gean de bijiao yanjiu. *Shehuixue yanjiu*, 22, 1–24.

英文部份 (English Section)

- Barker, M. (2008, April 22). *Mass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social movements*. Retrieved September 30, 2013, from <http://www.globalresearch.ca/mass-media-and-social-movements/8761>.
- Benford, R. D., & Snow, D. A.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11–639.
- Bob, C. (2005). *The marketing of rebellion: Insurgents,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 activ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s, M. (2008). The new public sphere: Global civil society,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6(1), 78–93.
- Chabot, S., & Duyvendak, J. W. (2002).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diffusion between social movements: Reconceptualiz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Gandhian repertoire and the “coming out” routine. *Theory and Society*, 31(6), 697–740.
- Della Porta, D., & Piazza, G. (2007). Local contention, global framing: The protest campaigns against the TAV in Val di Susa and the bridge on the Messina Strait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6(5), 864–882.
- Edwards, B., & McCarthy, J. D. (2004). Resources and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In D. A. Snow, S. A. Soule, & H. Kriesi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pp. 116–152). Oxford: Wiley-Blackwell.
- Fang, Y. J. (1994). ‘Riots’ and demonstrations in the Chinese press: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deology. *Discourse & Society*, 5(4), 463–481.
- Finkelstein, L. S. (1995). What is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1(3), 367–372.
- Finnemore, M., & Sikkink, K. (1998).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887–917.
- Gamson, W. A. (2004). Bystander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media. In D. A. Snow, S. A. Soule, & H. Kriesi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pp. 242–261). Wiley-Blackwell.
- Gamson, W. A., & Wolfsfeld, G. (1993). Movements and media as interacting system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28, 114–125.
- Garrett, R. K. (2006). 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9(2), 202–224.
- Ho P. (2007). Embedded activ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 semiauthoritarian context. *China Information*, 21(2), 187–209.
- Jenkins, J. C., & Schock, K. (1992). Global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in the study of domestic political conflic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8, 161–185.
- Kitschelt, H. (1986).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1), 57–85.
- Lee, C. C., & Yang, J. (1996). Foreign news and national interest: Comparing US and Japanese coverage of a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56(1), 1–18.
- Li, X., & St. Cyr, C. (1998). Human rights in China: A pawn of a political agenda?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New York Times (1987–1996).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0(6), 531–547.

- Liu, D. (2006). When do national movements adopt or reject international agenda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and Indian women's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6), 921–942.
- Marks, G., & McAdam, D. (1996).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2), 249–278.
- Matsuzawa, S. (2011). Horizontal dynamics in transnational activism: The case of Nu river anti-dam activism in China.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6(3), 369–387.
-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3).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deepblue.lib.umich.edu/handle/2027.42/50939>.
- Myers, D. J. (2000). The diffusion of collective violence: Infectiousness, susceptibility, and mass media network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1), 173–208.
- Meyer, D. S., & Tarrow, S. (1998). A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In Meyer, D. S., & Tarrow, S (Eds.),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pp. 1–28).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Nathan, A. J. (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1), 6–17.
- Norris, G. L., & Cable, S. (1994). The seeds of protest: From elite initiation to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7(2), 247–268.
- Olesen, T. (2005). Transnational publics: New spaces of social movement activism and the problem of global long-sightedness. *Current Sociology*, 53(3), 419–440.
- Ottaway, M., & Hamzawy, A. (2011). Protest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Arab world.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5, 1–14.
- Ron, J., Ramos, H., & Rodgers, K. (2005). Transnational information politics: NGO human rights reporting, 1986–200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9(3), 557–588.
- Stone, G. C., & Xiao, Z. (2007). Anointing a new enemy: The rise of anti-China coverage after the USSR's demi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9(1), 91–108.
- Tarrow, S., McAdam, D. (2005). Scale shift in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In D. Della Porta, & S. Tarrow (Eds), *Transnational protest & global activism* (pp. 121–150).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Thörn, H. (2007). Social movements, the media and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public sphere from anti-apartheid to global justice. *Current Sociology*, 55(6), 896–918.
- Tilly, C. (2004).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 Tsutsui, K., & Shin, H. J. (2008). Global norms, local activism, and social movement outcomes: Global human rights and resident Koreans in Japan. *Social Problems*, 55(3), 391–418.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0期(2014)

- Waisbord, S. (2008). Advocacy journalism in a global context. In K. Wahl-Jorgensen, & T. Hanitzsch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pp. 371–385). New York: Routledge.
- Walsh, E J. (1981).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citizen protest in communities around three mile island. *Social Problems*, 29(1), 1–21.
- Wang, X. (2008). *How American student journalists at a college newspaper consume, perceive, and disseminate news and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Master thesis, Nicholso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College of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Orlando, FL.

本文引用格式

黃廣生(2014)。〈跨國資訊政治：當地方性抗爭遭遇國際媒體〉。《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0期，頁157–190。